



[英] 弗·卡斯頓 著

法西斯主义的 兴起

商务印书馆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英〕弗·卡斯頓 著

周穎如 周熙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9年·北京

THE RISE OF FASCISM

By

F. L. Carst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0

(First Published, 1967, second edition, 1980)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增订第二版译出

FǎXīSīZHǔYì DE XīNGQǐ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英〕弗·卡斯頓 著

周颖如 周熙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423-3/K·53

1989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32 千

印数 2,200 册

印张 10

定价: 4.1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主要论述法西斯主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在欧洲兴起的过程。作者从历史角度出发,考察了法西斯思想的起源。作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同民族沙文主义有关,它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法国的极右翼反共和派法兰西行动党的主张:反对自由和民主制度,反对议会制度,反犹太主义,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推崇暴力和权力,等等。这些主张同尔后的法西斯运动所表现的特点极其相似。

作者接着以两章的篇幅论述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组织法西斯党和攫取政权的过程。作者分析了这两个法西斯巨头何以得逞的原因。墨索里尼利用意大利在战后出现的国家危机和经济困难,利用意大利当时泛滥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利用中产阶级对红色革命的普遍恐惧心理,加上议会政府软弱无能,军队警察以及行政当局的帮助,他夺取政权的阴谋遂能得逞。而希特勒的成功也因利用经济困难而使成千上万绝望的德国人加入他的阵营,他的纳粹党巧妙地进行组织宣传工作,使用暴力,不择手段地攻击德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煽动暴徒闹事,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攻击凡尔赛和约从而赢得企图恢复德国国际地位的人的拥护。此外,这两个人都有善于使用阴谋诡计来击败敌手的一套伎俩。

本书还旁及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比利时、英国、奥地利等国的法西斯运动的情况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法西斯主义的动向。

本书作者弗朗西斯·卡斯頓是英国伦敦大学历史教授，专攻中欧史和德国史，二十年代在柏林长大，目睹当时纳粹分子在柏林大学和街头闹事，还实地参观过希特勒等纳粹党魁出席的大会。本书叙述纳粹党徒的恶行具有真实性。作者还参考几十种专著写成此书，故史料比较丰富，对研究近现代世界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序”及一至四章是周颖如同志翻译的，五至八章是周熙安同志翻译的。

目 录

序	1
一、1914 年以前的民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	4
法国	6
意大利	13
德国	18
奥地利与波希米亚	29
俄罗斯	40
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45
战争及其后果	45
激进主义崛起	49
法西斯分子占上风	56
向罗马进军	64
逐步全面掌权	68
一党专政的国家	75
国际上的反响	82
三、民族社会主义:形成的年代	85
第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党	85
世界大战后的德国	88
慕尼黑的德国工人党	94
希特勒与民族社会主义党	99
竞争的组织和领袖	105
1923 年,决定性的一年	113
11 月暴动	118

《我的奋斗》	125
四、民族社会主义: 通向权力的道路	129
改组的年代	129
山雨欲来	142
危机	149
半独裁政府	156
夺取权力	161
一体化	166
五、东欧的几种法西斯主义	172
芬兰: 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到法西斯主义	173
修正主义和反犹太主义: 匈牙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	182
反犹与反共: 铁卫军	196
六、西欧的几种法西斯主义	211
西班牙: 从民族工团主义到长枪党	211
弗兰德: 从民族主义到法西斯主义	223
列克斯运动: 从好战的天主教到法西斯主义	231
英国法西斯联盟	239
奥地利的卫国军	245
七、法西斯运动	253
八、新法西斯主义	261
意大利	263
德国	270
英国	278
参考文献	287
索引	293

序

7

本书论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几个主要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历史。由于一些明显的理由,本书的注意力首先集中于法西斯运动发端和取得政权的几个国家: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本书虽然对这些国家的法西斯运动历史叙述详细,但未包括法西斯党和民族社会主义党^①执政时期的情况,因这是完全不同的题目,需要另写一本书来阐述;然而,就本书主题而言,有必要简略叙述罗马—柏林—维也纳三角以外的几个欧洲国家的法西斯运动。不过本书不拟谈论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因为这样会使本书变得相当冗长乏味而且啰嗦重复。第五章和第六章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国家的法西斯运动,这是或因该运动本身力量特别强大,或因其呈现的特点不同于意大利和德国制定的模式。

因此,本书对诸如挪威和荷兰等国规模很小而又不重要的法西斯运动有意略去,因为它们只是在德国占领时期靠柏林的扶植才短暂地得势的。同样,书中除了在第一章对法兰西行动党略加叙述外,对法国各个法西斯政党也没有谈及,因为这些政党一直是规模很小并且没有什么势力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雅克·多里奥领导的法兰西人民党,该党主要是以其激烈反共著称,这种现象出自一个由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领导的党并不奇怪。然而,仅仅激烈反共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正如激烈反犹太主义同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一样),因为真正的法西斯政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这在它们的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我们将

^① 一译作“国家社会主义党”。——译者

8 在本书中讨论。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某些东欧国家(例如波兰或立陶宛)的独裁政权并不是靠法西斯党的崛起和取得最后胜利才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代表一种更为老式和保守的独裁类型,类似更早的年代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其他地方建立的那些独裁政权。尽管这些独裁政权受到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勃兴的影响,并且显示某些“法西斯”的特征,但本书也不去谈它们的历史,因为它们的主要特征上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不过本书把西班牙真正的法西斯党长枪党的发展史则包括在内。倘若读者认为这种区分多少有些武断,作者只能申辩说,我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并且希望在叙述过程中提出的论点能说服读者。作者的目的在于包罗万象,而在于举出一些有意义的例子。尤其重要的是,我希望能说明,在一些具有古老文化、高度教育水平和文明行为传统的国家,法西斯运动怎么会不仅得到了发展,而且还形成群众运动并夺取了政权。

作者是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年代中在柏林长大的。所以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是描述作者目睹的一些事件的。作者在写本书时把这些个人回忆加进去,这样可能使作者的判断更具有特色;我清楚地记得以下情形:这些年代的气氛,同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大学生进行的讨论,这些学生在各大学的强大势力,我所参加过的有阿道夫·希特勒、奥托·施特拉塞尔以及其他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发表演讲的集会,在街头和会场发生的冲突,等等。这种政治气氛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一章力求向读者说明这种气氛。

最后,作者希望能对曾经阅读过全部或部分手稿或提出意见的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是:戈登·A·克雷格教授、哈里·赫尔德博士、伊斯特万·德亚克博士和尤金·韦伯教授。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和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的胡佛图书馆的工作

人员都曾为我提供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文件和小册子，如果没有这些材料，本书就会大为逊色；作者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不过，我尤其感谢我的妻子：她曾就本书的主题同我进行过无数次的讨论，她曾详尽地向我提出很多修改的意见。

F. L. 卡斯頓

1966 年 10 月于伦敦

一、1914 年以前的民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大战的大动乱及其造成的破坏和危机，以及对许多欧洲国家出现的“红色”革命的恐惧，才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法西斯”的以意大利为榜样的运动。1918 年以后的世界是一个被流血冲突、政治仇恨、内战、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动乱等搞得四分五裂的世界。相形之下，1914 年以前的世界是个和平的安乐窝。西欧和中欧任何地方的法律和秩序都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繁荣和经济进步是那时的常态。1871 年的巴黎公社宣言并没有在欧洲肇始革命的新时代，不管马克思及其信徒对这次巴黎无产阶级起义曾作了怎样的解释，这次起义是十九世纪最后一次革命事件。只是沙皇俄国于 1905 年日俄战争中战败后，国内爆发了一次新的暴力革命，这是即将发生事件的预兆。但它在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引起反响。其他国家的统治秩序、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稳固，中产阶级的兴旺看来都是永远固定不变的了。殖民扩张和瓜分其他大陆促进这种繁荣，尽管也造成了许多冲突。陆、海军军备费用不断地增长——回顾起来这是个不详之兆——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带来了巨大利润。即使欧洲天边出现乌云，但看来乌云也不是很吓人的。

这些乌云之一是经济发展本身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在多数城镇中构成人口主体的中产阶级下层所处的地位，受到两方面的威胁，¹⁰ 一方面是工业和商业的集中过程中建立了越来越大的企业，另

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兴起和他们大声疾呼要平等，要政治权利。至少在某些西欧国家，例如意大利或法国，存在着极左的真正革命运动，而且到处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马克思曾预言大多数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将被推到无产阶级的地位；即使这一预言后来证明并不正确，但许多中产阶级分子就是害怕丧失他们的安全和特权地位。中产阶级也可能受到新来者和移民的威胁，而且，在中欧许多地区，还受到某些新民族国家或不大受欢迎的民族兴起的威胁，而这些民族直到最近才拥有自己的中产阶级。在一个竞争性越来越强的世界里，虽然犹太人新近才获得解放，但在许多国家构成了这种威胁；而且其他少数民族或派别——新教徒、捷克人或波兰人，看各国情况而定——的上升，也会在一些人之间引起相似的恐惧，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地位遭到破坏或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侵蚀。他们对真正的或想像中的威胁的反应并没有产生“法西斯主义”，但在这个1914年以前的世界遭到大动乱的破坏后，这种反应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从一开始必须注视这批人在几个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在1914年以前，他们没有机会掌握政权；他们的影响局限于范围比较小的少数人中，局限于被剥夺了继承权和心怀不满的人中。然而，他们的意识形态却延续到战后时期，那时他们所处的气候很有希望供他们茁壮成长。而他们的成员——在某些重要的情况下，还有他们的领袖——持续活跃，并把战前和战后的世界连贯起来。

虽然这些运动在各国极不相同，但也有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一种与十九世纪保守派或自由主义派极不相同的民族主义，人们因而创造了“新右派”这一名词来称呼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也是强烈反犹太人的，随便把犹太人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祸害的替罪羊。最后，他们不仅要在中产阶级和中产

阶级下层引起共鸣,而且还要投合底层阶级的心意,企图使他们放弃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想,从而为这个新运动提供一个民众基础。这时还不是群众民主的时代,但这些领袖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使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反对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的思想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话,这样一个群众基础是必不可少的。

法 国

法国曾在1870年—1871年的法普战争中战败,并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胜利者。结果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决不光是局限于政治上的右翼——并且要求复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常胜将军”布朗热想要率师越过莱茵河去解放失地,他的运动是从右的方面第一次对共和国形成了威胁。保罗·德罗莱德及其“爱国者同盟”成立一个准备发动政变的极右翼组织,煽起不满情绪并且热衷于使这位将军入主爱丽舍宫;但是这一运动不光彩地失败了。布朗热逃到国外,而共和国也就得救。然而没过几年,巴拿马公司的倒闭^①以及由此引起的丑闻又为猛烈攻击共和国,特别是攻击应对这一丑闻负责的一些犹太金融家的人提供了新资料。

这时有人创办了一份新刊物《自由言论》来和“国际犹太人金融”势力作斗争,而这份刊物及其主编也大出风头。主编就是爱德华·德律蒙,他在1886年曾因出版一本书而一举成名;这本书叫《犹太人的法国》,出版后立即销售了几千本。书中描绘古老法国的田园诗般的风景,但这个法国已被犹太人摧毁和征服。此书攻

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工程师莱塞普等组成的运河工程公司与哥伦比亚订约,取得巴拿马运河修建、租让权,九十年代施工过程中困难重重,同时公司的一些首脑人物多系政治冒险家和犯罪分子,他们侵吞了多次发售的巴拿马运河股票而聚集的大批资金,并向法国一些部长和议员进行巨额贿赂。1889年公司宣告破产,案发后牵连受贿的有一百五十名议员和部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巴拿马公司丑闻。——译者

击现代文明，说它使人类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上堕落和受屈辱。被小店主、商人和工匠所憎恶的犹太人变成金融势力和资本主义秩序的象征，这引起了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恐惧与愤懑。“唯一从大革命中捞到好处的是犹太人”。犹太移民，诸如罗思柴尔德家族等，在法国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而他们的财富是造成法国遭受一切不幸的原因。犹太人自古以来也曾经犯过其他许多罪行；他们是魔鬼，必须把法国从他们手中解放出来。不过德律蒙还攻击了主要的政客和金融家、教皇、主教、天主教会、大贵族和王室成员，在他¹²看来，所有这些人不是帮助犹太人，便是讨好了犹太人。巴拿马公司丑闻为德律蒙提供了所需要的材料；他是法国反犹太主义组织的创建者，还赋予这个组织以鲜明的反资产阶级色彩。他发现反犹太主义是一个对群众具有吸引力的主题。

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的其他力量也强烈反对共和国本身及其所体现的种种传统，如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传统，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十九世纪末，就被指控为德国充当间谍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究竟是否有罪，在亲共和国派和反共和国派两种力量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冲突，从而动摇了既定秩序的根基。德雷福斯碰巧是个犹太人——这一事实与对他产生怀疑不无关系——再加上他的堕落行为，就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随后几年间要求重审的呼声逐渐高起来了，埃米尔·左拉在1898年初发表了他的著名的《我控诉》一文，为德雷福斯辩护。不久，得到证实，据以对德雷福斯起诉并定罪的主要文件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对这一伪造事件负有责任的亨利上校被捕并且自杀了。然而这些事件既未能使德雷福斯事件结束，也没有使他的许多敌人就此住口。此事涉及的要人太多，同时也与许多根深蒂固的偏见有关。

1898年春，在左拉发表了《我控诉》和为响应他的呼吁而成立的“人权同盟”后的几个月，有两个对这些事件和法国的困境感到

厌恶的青年人，创立一个“法兰西行动委员会”。这两个人是莫里斯·皮若，二十六岁，是他自己创办的一份文艺评论杂志的主编；亨利·沃热瓦，一位三十四岁的哲学教员。这个委员会的呼吁书提出，为德雷福斯翻案的运动就象是巴拿马公司丑闻的复活，仅仅是为那些腐败的政客和金融家们的利益效劳。在这一年年终，皮若在《法兰西的行动》一文中，猛烈攻击了议会制度和个人主义；他认为法国必须重新恢复它的强大，必须“改造成……国内是有组织的，对外是强大的国家，就象 1789 年大革命前在旧制度下的那样”。1899 年 6 月，沃热瓦向那些深受德雷福斯事件煽动的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公众宣讲了“法兰西行动”；不久，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公报。于是运动就发动起来了。它的领袖是一批知识分子，忙于无止境地讨论，并决心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及其一切主张作斗争。他们中间的首脑人物是夏尔·莫拉斯，一位作家，这时还不到三十岁。

莫拉斯出生于法国南部一个曾依附于拿破仑第三的保皇党家庭；在他看来，共和国是法国衰败的最后阶段。他坚信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是公正的，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即使证明德雷福斯无罪，也不能原谅那分裂法国、削弱军队并危及国家生存的煽动性言论。他认为，亨利上校是在狱中被暗害的，是一位英雄，必须为他的流血报仇；德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民族的敌人。但莫拉斯的敌人不仅是德国人和英国人——法兰克福和伦敦是国际金融的两个中心，也是那两个敌对国家的化身——而且还有更大的敌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新教徒，他们是针对法兰西和天主教而组织穷凶极恶阴谋的主谋者。四种互相联系的社会政治集团构成莫拉斯所谓的“反法兰西”分子：犹太人——在法国的外籍人，新教徒——背离法国思想而去接受德国、瑞士和英国思想的法国人；共济会会员以及其他反教会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反法兰西盟友观点一致；

最后还有外国佬——这个词借用于古雅典，意指外侨。所有这些都靠法国的财富养肥自己，都是同一支强大军队、同法国传统及其核心天主教为敌的。^① 根据莫拉斯的看法，这种“反法兰西”的精神渗透到由这敌对的四种社会政治集团把持的法国大中学的历史教学中；因此才有这么多知识分子站到德雷福斯一边。犹太人是造成分裂的因素；他们的传统观念要求他们敌视法国的传统观念，几百年前的胡格诺派教徒就曾使他们自己切断与真正的民族传统的关系；所有这些集团不是忠于法国，而是忠于外国政府的。

在莫拉斯看来，法兰西是一位女神，是“奇迹中的奇迹”，特别美丽，她要求人们绝对的忠诚。莫拉斯尊崇旧制度，憎恨法国大革命和曾给法国带来混乱和衰落的启蒙运动。¹⁴ “革命的根本在日内瓦、在维滕堡、在古代的耶路撒冷；它们起源于犹太精神，起源于在东方荒野和德意志原始森林等各野蛮中心风行的一种独立基督教派的变种。”^② 民主等于无政府状态；它缺乏一种行动和首创精神的果断原则；使国家成为贪婪和集团利益的牺牲品；民主是软弱无力和有害的。法国如要恢复它曾有过的强大，就必须重建君主政体；因为只有世袭的君主制度能给国家带来统一、稳定和权威，如没有这些因素，国家就会土崩瓦解。法兰西行动党最初的领袖只有莫拉斯是君主主义者，但保皇主义在法国日趋衰落的时代，他却成功地使其他人都改变了信仰。君主政体必须靠武力来恢复，否则，政府将是软弱无力的，不能够组织起拥护自己的力量；因而会被一

① 引自 Maurras' *La Démocratie religieuse*, p. 90, by D.W. Brogan, 'Nationalist Doctrine of Charles Maurras', *French Personalities and Problems*. London, 1946, p. 69; 还引自 *L'Enquête sur la monarchie*, pp. 535—6, by E. R. Tannenbaum, *The Action Française*, New York, 1962, p. 73.

② 引自 *Romantism et Revolution* 序, *Œuvres Capitales, II*, p. 33, by Ernst Nolte, *Der Faschismus in Seiner Epoche*, Munich, 1963, p. 170.

种“保守的革命”所推翻。

法兰西行动党的任务就是组成这个将成为新法兰西统治集团的杰出人物的少数派，“这个党将创造历史并将获得群众的拥护。”^①根据莫拉斯的意见，这个杰出人物集团将由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组成，如优秀的军官、优秀的作家和哲学家、优秀的公务员；它将是一个知识界的杰出人物集团。是莫拉斯使法兰西行动党有一套理论，而这是其他法国右翼集团所缺少的。有了这套理论，它能够发展和生存下去。然而同时它也过于保守和因循守旧，过于唯我独尊和书生之见，还有它那过时的保皇主义，因而对群众，特别是产业工人不能起号召作用。它的领袖们出身于中产阶级，从事脑力劳动，这也使他们不能成为领导一场革命运动的领袖。

1906年初，“法兰西行动”学院创立。莫拉斯在那里主讲政治学，学院还设有政治、历史、对外关系、民族主义和社会科学等课程，后来还编印出书。几个月之后，最高法院撤消了对德雷福斯的
15 判决并宣布他无罪；但法兰西行动党拒不承认宣判他无罪并重新掀起反对“德雷福斯派”的宣传鼓动，青年保皇党人攻击并毁坏那些曾经支持争取复审运动的人的塑像。1908年《法兰西行动》（最初是双周刊）改为日报，靠作家莱昂·都德资助和向公众募捐维持。然而印行的报纸很多都无法销售，亏损严重；此外还得经常支付巨额法院诉讼费以及对报纸的重罚款。法兰西行动党的势力日增，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大学中。1908年5月，这个组织煽起一次反对巴黎大学的一位教授的骚乱，因为他为了增进法德两国的相互了解，曾在假日里率领一群学生到德国去，结果他的讲座被迫中止。1909年初骚乱分子迫使另一位教授中止讲课，因为他在圣

^① 引自 *L'Enquête sur la Monarchie*，第469、500、509页，转引自前引书第179页。